

不佳京師可託人代呈然此人
首尾一律尤形不得參雜五元
免驗亦不必重驗 欵
就憑半信今呈驗者當照原
愈名蓋印倘印信模糊或失誤
可將生絲之海關稅代運出
然每代運出以
查驗一律
江流弊 爲十一欵倘如

包其中仍分種在精者每正
驗過
呈驗者
經呈驗者
白劬烏頭
欵良

呈驗者
其表之
第七
欵承辦生絲出口
內所絲出口倘逾半年
民
日

國聞報

國聞報
外二種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聞報(外二種):全十冊 / 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整理.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 - 7 - 5013 - 4477 - 2

I. ①國… II. ①孔… ②村… III. ①報紙—天津市—清後期 ②戊戌變法—研究 IV. ①G219.295.2 ②K256.5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51004 號

書 名 國聞報(外二種)(全十冊)

著 者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郎 整理

責任編輯 南江濤 王燕來

封面設計 九雅工作室

出 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 行 010 - 66114536 (傳真), 66126153 (郵政), 66151341 (郵政), 66175620
66121706 (傳真), 66126153 (郵政)

E - 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裝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 張 415

字 數 6000 千字

書 號 ISBN 978 - 7 - 5013 - 4477 - 2

定 價 7800.00 圓



出版說明

本書收錄清末嚴復主編的《國聞報》八八八號、《國聞彙編》六冊和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新聞雜誌操縱關係雜纂——國聞報（在天津漢字新聞）》檔案一宗。整理者孔祥吉和村田雄二郎撰寫了翔實的研究文章——《從中日兩國檔案看〈國聞報〉之內幕——兼論嚴復、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聞實踐》，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國聞報》從辦報到停刊的過程，可資導讀。在這裏，我們僅對收錄的三種文獻略作介紹，供大家參考。

《國聞報》創刊於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共出報兩種：『日報每日印一張，計八開，用四號鉛字排印，名曰《國聞報》。旬報十日印一冊，約計三萬言，用三號鉛字排印，名曰《國聞彙編》。』這份報紙由嚴復、夏曾佑、王修植等主辦，是清末維新派極其重要的宣傳陣地，在維新運動中影響很大，與上海的《時務報》分據南北輿論界的領導地位。其日報的內容按順序是本日電傳上諭、路透電報、本館主筆人論說、天津新聞、京城新聞、華北各地新聞、外國新聞，至於東南各省的新聞，由於『東南各報館言之甚詳，本館一概不述』。《國聞報》在《緣起》中自稱『略仿英國《泰晤士報》之例』，目的是『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這正是《國聞報》的辦報方針，而與維新派的其他報紙比較看來，它尤其在『通中外之故』方面表現突出，花費的力量最多，起到的作用也最大。

戊戌變法後，《國聞報》遭清政府查辦，幾經周折，賣與日本人。一八九八年十二月被迫停刊。一九〇〇年一度復刊，出到第八八八號（四月二十八日）最終停刊。其旬刊《國聞彙編》更是在出版了六冊之後，就停止了。《國聞報》從創刊到終刊僅有兩年多時間，但在晚清報刊史上卻佔據著重要地位，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首先，《國聞報》和《國聞彙編》發表了《天演論》和《群學肄言》（即《斯賓塞爾勸學篇》）的部分譯文，第一次向我國讀者介紹了進化論的思想。《天演論》原名《進化論與倫理學》，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著作，旨在介紹達爾文關於生物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嚴復一八九五年將這部著作譯出，但沒有正式出版。《國聞彙編》創刊伊始，即連載此文，使其較早進入了我國讀者的視野。《群學肄言》原名《社會學研究法》，是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爾的代表作，用進化論的觀點研究社會問題。這部書的全譯本一九〇三年纔出版，而此前在《國聞彙編》發表的部分篇章，也使它得以提前與讀者見面。這兩種書雖然有其不足之處，但在當時中國的歷史條件下，譯介這兩部書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不容低估。通過這兩部書的譯述，嚴復向中國人民發出了民族危亡的警鈴，呼籲祇有順應「天演」之規律，厲行變法，纔能由弱轉強，獲得生存的機會。在當時，這樣的觀點無異於晴天霹靂，振聾發聵，產生了極大的政治影響。

其次，《國聞報》對其時蓬勃開展的維新運動與陸續頒行的變法新政做出了及時而充分的報道，為資產階級政治改良運動進行了輿論上的鼓吹。它先後積極宣傳保國會、百日維新，尤其是對「百日維新」的宣傳，居功至偉。在戊戌維新運動後期，特別是「百日維新」時期，由於頑固勢力的阻撓、壓制和破壞，各地維新派的報紙紛紛偃旗息鼓，能夠披堅執銳、戰鬥到底的，為數至渺。像《國聞報》這樣，能夠在版面上為月旦之公評的，幾乎絕跡。這也是歷史上《國聞報》產生重大影響的原因之一。

《國聞報》是歷史的記錄，有助於中國近代史之研究，而對《國聞報》本身的研究，卻不夠充分。二〇〇二年以來，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進行了調查研究，收穫頗豐。尤其是《新聞雜誌操縱關係雜纂——國聞報（在天津漢字新聞）》這宗檔案的發現，對《國聞報》內部的若干重要問題的討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宗檔案包含了《國聞報》創辦過程中遇到的種種打擊和壓制，辦報人的艱辛周旋，賣與日本人以求保持言論平臺的無奈，以及日方接管的細節、國聞報館的財務收支狀況等等。這些珍貴的檔案資料，無疑是研究《國聞報》的必備材料，我們此次將其一併收入，供廣大讀者參考。

此次影印，我們歷經數年，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兩家單位所藏的《國聞報》進行配補，除了廣告頁以外，內容全部補齊，並且按期次做了目錄，標識了舊曆和西曆的對應日期；同時把《國聞彙編》各期的欄目標出，希望能為使用者檢索提供方便。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九月

從中日兩國檔案看《國聞報》之內幕

——兼論嚴復、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聞實踐

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

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發兵侵佔膠州灣，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沙皇俄國亦蠢蠢欲動，企圖將侵略魔爪伸向旅順大連灣。英在長江，法在兩廣，日在福建，均各有所圖。中國已經進入了瓜分豆剖、亡國滅種的時刻。在此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天津地區的維新志士，點亮了一盞光芒四射的明燈，號召全國上下奮起變法，力圖救亡，這就是在晚清報刊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國聞報》。

然而，對於《國聞報》的研究目前還很不充分。諸如該報之創建過程，誰是《國聞報》的真正主人，嚴復扮演了什麼角色，為什麼而後又挂上了日本的旗號，戊戌之後《國聞報》命運如何等等重大問題，長期以來，人們並不清楚。

自二〇〇二年以來，我們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進行了調查研究，頗有收穫。尤其是該館藏有一套完整的檔案，其名曰《新聞雜誌操縱關係雜纂——國聞報（在天津漢字新聞）》^①。本文擬圍繞中日兩國檔案，對《國聞報》內部若干重要問題予以討論。

①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該檔案編號為一門三類一項第一—五號。本文以下所引日本《國聞報》檔案除特殊注明外，均出自此卷宗，不再一一羅列。

一、《國聞報》出現前夕國內政局之特點

《國聞報》成立前夕，適逢中華民族的危機非常嚴重的時刻。當甲午戰爭的硝煙，在神州上空尚未完全消失之際，以嚴復為代表的天津地區有維新變法思想的知識分子，由於處於這場戰爭的前沿，他們已經從切身經歷中感受到了古老中國已經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危機。

這種危機感主要體現在嚴復的幾篇著名論文中。隨著《直報》的創刊，嚴復接二連三地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原強續篇》《救亡決論》等五篇論文。在這些使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嚴復以犀利的筆鋒，痛陳中華民族面臨著被列強瓜分的厄運，指出中國唯一的出路就在於改弦更張，採用西法。嚴復《論世變之亟》中揭出中國當時的形勢之危：『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而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爲此』。嚴復在這裏把那些阻礙維新變法的守舊勢力，斥責為毫無心肝的狂妄之徒。

嚴復還利用近代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從社會制度上尋找阻礙中國進步的原因，把批判的矛頭直指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他在《辟韓》中，尖銳指出：『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正是他們這夥大盜，『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嚴復說『夫自秦以來』，顯然是包括清朝。當時在封建衙門裏擔任一官半職的嚴復，居然敢把歷代封建帝王斥為強盜，公然揭出了尊民叛君的旗幟。

嚴復的這些論說，抨擊時弊，振聾發聵，在神州大地引起強烈反響。

兩年以後，當德國帝國主義侵佔膠州灣事件發生後，國內局勢動蕩，俄國企圖利用《中俄密約》在中國攫取更多利益。因此，中國的維新志士在丁酉、戊戌之交，對於俄國的侵略野心十分警惕。不少人以為應該聯合英日，對抗沙俄。以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代表的生活在南方的維新志士，很早就有這樣的主張。康有為於膠州灣事變之後，幾次上書都強烈表達了這種思想。而生活在北方的嚴復、王修植等維新派人士，亦與康梁之意見不謀而合。他們從內

心深處憎惡俄國之陰謀詭計。在封疆大吏中，即使是甲午戰後首倡與俄結盟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亦有聯合英日，抵制俄國的政治傾向。

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出現這種政治傾向絕非偶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沙俄挾干涉還遼之功，一方面在清廷上層進行滲透，物色自己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則勾結德國，密謀策劃，狼狽為奸，貪婪地在中國攫取利益。尤其是德國悍然出兵侵佔膠州灣之後，沙俄的侵吞旅順、大連灣的野心，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在長江流域執掌政柄的劉坤一、張之洞已逐漸覺醒，認為那種『一意依俄，可保二十年太平無事』的主張，無異於白日做夢，與虎謀皮。他們這種聯合英日的主張得到了康有為、嚴復等維新派的贊同與擁護。其二，這種政治傾向的出現，與日本外交官及參謀本部人員在華宣傳策動亦有很大關係。日本爲了自身侵略利益，多方面在華活動。他們一面極力揭露沙皇俄國蠶食中國的陰謀，一方面鼓動與英日結盟。尤其是日本參謀本部派遣神尾光臣與宇都宮太郎等在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周圍充當說客，陳明利害，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們不但在封疆大吏的衙門裏晝夕密談，深謀策劃，而且還利用一切機會，向江浙、湖廣等地關心時事的知識分子高談闊論，施加影響。

他們的言論，在那些立志改革的維新派中間，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日本女子大學的久保田文次與吉良芳惠教授，向筆者提供了幾份宇都宮太郎向參謀本部的報告，該報告如實地記述了他在武漢期間數次會見張之洞、譚嗣同，宣傳其政見的情形。^①當然，宇都宮太郎的報告，祇談到了他會見譚嗣同等人的具體時間與地點，以及彼此交談的簡單內容。宇都宮太郎並不瞭解，他的鼓動具體產生了何種成效。然而，譚嗣同卻很快將這種觀點在維新派內部擴散。與譚嗣同情同手足、親密無間的摯友唐才常，很快又將從譚氏那裏聽到的宇都宮太郎的論說，撰寫論文，廣爲傳播。

唐才常所記載的日本軍方代表言論如下：

① 宇都宮太郎：《致參謀本部第三部長福島安正臨時報告》（未刊稿）。

日本知其然也，故遣其參謀部三人來華密籌焉。曰神尾光臣，曰梶川重太郎，曰宇都宮太郎。正月之杪，譚復生見三人漢口。神尾言曰：『彼我本兄弟國，貴國遇我良厚，不意朝鮮一役，遂成仇讐。又不意貴國竟不能一戰，挫衄不可收拾。嗣茲以來，啟各國心，危若朝露，每一回首，悔恨何及。然貴國亡，必及我，我不聯貴國，將誰聯？今大地師艦，麇集鱗萃，吮血磨牙，睜睜相向，不於此時薪膽為雄，練兵興學，更優游卒歲安乎？時乎時乎不再來，願君熟思，同往我國，謀定後動……如聯盟計成，吾當為介於英，而鐵軌資焉，國債資焉，兵輪資焉，一切政學資焉。』

日本軍方人士的這些娓娓動聽的演說，對維新派產生了出乎意外的效果。無論是當時尚在南方的唐才常、譚嗣同，還是已經來到北京的康有為等，都異口同聲地呼籲中日結盟，以為是千載一遇的大好機會。

康有為於《自編年譜》中寫道：

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發炮據膠州，擄去提督章高元。朝廷託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張樵野日與議和未就，日人參謀本部神尾、宇都宮來覓鄂督張之洞，請助聯英拒德。時經割臺後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日使矢野君極有意，而吾政府終不信是議。乃為御史楊深秀草疏，請聯英日。又為御史陳其璋草疏，再請聯英日。

清宮檔案的記載表明，康有為代楊深秀草擬的請聯英日摺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呈上清廷，該摺聲稱：

即日本亦有聯我之心。蓋事機立變，雖仇國亦當合也。昔楚王恨商於之誑，怒思伐秦，而陳軫即勸其合秦以攻齊。蜀先主恥猊亭之敗，日圖報吳，而諸葛亮即勸其合吳以伐魏。故我若聯日本，日本自計，亦必可聽從，而我仍以濟成結英之勢也。

〔一〕唐才常：《論中國宜與英日聯盟》，《唐才常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一五二頁。

〔二〕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神州國光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冊，第一三八頁。

〔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臺北南港近史所藏）光緒二十三年卷。

康有為代御史陳其璋草擬的奏疏，亦在其未刊稿中發現。其文曰：

按英之海權，甲於歐洲；日之智力，雄於東方。其能與俄抗者，莫如英日。朝鮮甲午之師，日有悔意，泰西持盈之局，英有全謀。其能與我近者，亦莫如英日。況近聞英有與我聯合之說，向北洋陳請。又英國《泰晤士報》云，為中國謀，當保護自主之權。又日本《新聞報》大隈伯論佔據膠州為盜賊之行，有損各國和局。窺其意雖出於忌俄之口，而公道尚有可言，似宜密與訂交，以示鉗制。近可解德人非常之舉，遠可消俄人無厭之謀。此國勢所關之利害，皎然易見也。(一)

通過聯日，進一步實現『結英之勢』。康有為等維新派的思路與劉坤一、張之洞等封疆大吏不謀而合，其議論如出一轍，對聯日充滿了美好的幻想。維新志士們真誠地以為，祇有聯合日本纔能實行變法；祇有走日本之路，中國纔能擺脫危機，走上自強之路。因此，可以斷言聯合英日，抵制沙俄，已經成了全國上下、大江南北維新志士的共同主張。

康、梁的這種聯合英日的主張，通過夏曾佑等在天津地區產生了連鎖反應。因此，無論是嚴復，還是王修植、夏曾佑，都對沙俄的侵略政策深懷戒備之心。可以說，早在《國聞報》成立之前，天津的維新志士，即對俄國的侵略野心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

二、以嚴復為靈魂之《國聞報》創立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國聞報》正式在天津創刊。這是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一

(一) 陳祖治整理：《清御史陳其璋遺草疏稿彙集》，第一冊。

件大事。

由嚴復執筆寫出的《國聞報緣起》一文中宣稱：「閱茲報者，觀於一國之事，則足以通上下之情；觀於各國之事，則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後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後國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則積一人之智力以爲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強；國不自私其治，則取各國之政教以爲一國之政教，而吾之國強。此則本館設報區區之心所默爲禱祝者也。」⁽¹⁾

《國聞報》每日出兩張，鉛印，每期約萬字左右，刊登時事新聞，並以社論形式，表達嚴復等人的政治觀點及傾向，其中許多重要評論均出自嚴復手筆⁽²⁾。由其緣起所述可知，《國聞報》發行的目的，就是要「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這是嚴復自甲午戰爭之後多次強調的要溝通上下，民意上達，以及瞭解外部世界，向西方國家學習。爲達到此目的，在《國聞報》出刊不久，又接著發刊《國聞彙編》。

按照通常的說法，是嚴復與夏曾佑、王修植一起創辦了《國聞報》。這種說法嚴格說來並沒有錯誤，但失之籠統。另一種說法是日本人的觀點，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日本人認爲：王修植爲《國聞報》之館主，夏曾佑則爲報紙主筆，嚴復、王文韶、陶大均等則爲與報紙有重要關係的人物⁽³⁾。其實，這種看法祇是看到了表面現象。日本方面尚不清楚，嚴復纔是《國聞報》的靈魂。

我們之所以稱嚴復是《國聞報》之靈魂，是因為這張報紙的主要內容，體現了嚴復的思想與追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國聞報》是嚴復一生中所辦成的最輝煌的事業之一。嚴復早年留學英國期間，已認清報紙對開化民智，國家進步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梁啟超、汪康年等人所創辦的《時務報》在神州發行伊始，嚴復即滿懷熱情地予以謳歌。他在給汪康年、梁啟超之信件中深情地寫道：

(1) 王栻主編：《嚴復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第二冊，第四五五頁。

(2)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二冊，第四二二頁。

(3)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鄭永昌致外務省次官小村壽太郎報告》明治三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新聞雜誌操縱關係雜

穰卿進士、卓如孝廉均鑒：

啟者，前寄一函，想經偉照。昨公度觀察抵津，稔大報一時風行，於此見神州以內人心所同，各懷總干蹈厲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僅振聵發聵、新人耳目已也。不佞曩在歐洲，見往有一二人著書立論於幽仄無人之隅，逮一出問世，則一時學術政教爲之斐變。此非取天下之耳目知識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餘地已耳。使中國而終無維新之機，則亦已矣。苟二千年來申、商、斯、高之法熄於此時，則《時務報》其嚆矢也，甚盛甚盛。寄上匯票百元，到時乞與察入，付據。區區不足道，聊表不佞樂於觀成此事之心云爾。手此，敬頌撰安。侯官嚴復頓首。八月十八日。^{〔一〕}

嚴復認爲，《時務報》刊行的重大意義，在於它能摧陷廓清守舊勢力的重重黑幕，啟動中國的維新之機。字字句句顯示了嚴復對創辦近代報刊與政治革新之間相輔相成關係的先見之明。這是通達外情的嚴復所具有的遠見卓識，絕非當時一般士大夫所能達到的認識水準。這封信也流露出嚴復對創辦一份新報紙的嚮往。

一年多之後，嚴復即著手在天津創辦自己的報紙《國聞報》。在《國聞報》創刊前夕，嚴復在給梁啟超等人之信件中稱：

卓如、孺博、穰卿三先生閣下：

每懷風采，延企爲勞。伏維台候萬福，爲時自重。上月託公度觀察袖呈《國聞報》啟一通，求登貴報，俾我下乘附驥而行，諒荷垂察。拜讀三十五大報，尚未附錄，殊爲懸盼。陳錦濤至津備述尊意，愛我之情至爲周密，感荷感荷。弟等本議旬報之外兼出日報，日報則僅詳北數省之事，旬報則博採中西之聞，與尊屬一節正相符合。現在資本已集，印機已購，開辦之期即在來月，伏乞將前寄啟文趕爲登錄，將來出報之後，南中各省埠尚擬依附貴館派報處代爲分送，素紉公誼，當亦樂觀其成也。啟中文字有未審處，尚求雅削。專泐，公敬台安。弟嚴復、夏曾佑、王修植同再拜。

廿五日。(八月初一到) (三)

此信是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寄到上海的。雖然信末還有夏曾佑、王修植的署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嚴復之手筆。它與本文上引嚴復致汪、梁信件，從內容到文風，均一脈相承。再有，夏曾佑之名署在王修植之前，這一點也很值得注意。它似乎可以說明，在嚴復看來，夏曾佑在創辦發行《國聞報》中的作用，又稍稍多於王修植。

嚴復是《國聞報》之靈魂，還可以由主筆夏曾佑致汪康年信中得到印證。夏氏於光緒二十四年初春，寫信給汪康年稱：

毅伯表兄左右：

……弟自復入都門，又由京至此，朋友之聚，譚讌之樂，自絕勝於不雨之郊。然能屏絕塵氛，學思並進，則生平亦難遇此境也。到津之後，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輒過談，談輒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徐、利以來，始明算術；咸同之際，乃言格致。洎乎近歲，政術始萌，而彼中積學之人，孤識宏寰，心通來物，蓋吾人自言西學以來所從不及此者也。（《天演論》為赫胥黎之學，尚有塞彭德之學，名《群靜重學》，似勝於赫。又言中國大易確係非拉索非各種人之古書。自印度外，無及之者。）但理蹟例繁，旦夕之間，難於筆述，擬盡通其義，然後追想成書（樊師《地論》即用此例），不知生平有此福否。慈恩諸論，晨夕肆力。其旨幽深，其例繁密，其文奧衍，欲輒業者屢矣！而每念自昔通賢，凡有志於內典者，大都自此處自厓而返，以故真如正智遂不顯於世間。念此發奮，不自揣度，竊欲於去來今教誨之中，一葉扁舟，亂流而渡，若濟，吾之幸也；不濟，則一期僵石之間，螺蛤聖賢，同歸黃土。為之也若此，不為也亦若此，吾亦何據以自悔耶，吾往矣…… (三)

夏曾佑（一八六三—一九二四）字穗卿，號碎佛，筆名別士，浙江杭州人。甲午戊戌間，與梁啟超交往密切，情同

(二)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四冊，第三二七—四頁。

(三)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二冊，第一三二—五頁。

手足，頻頻通信，探討人生價值與中國改革的出路。《梁啟超年譜長編》甲午年曾對二人關係有詳細描述：

是年，是先生和夏穗卿先生來往最多的一年，這年他們在北京研究學問、討論問題、提倡新學，非常有精神。他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和《清代學術概論》裏，講那時候的情景非常詳細。茲擇錄如下：

『我十九歲始認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裏頭，他算是第一個。初時不過「草草一揖」，了不相關，以後不曉得怎樣便投契起來了。我當時說的純是廣東官話，他的杭州腔又是終身不肯改的，我們交換談話很困難，但不久都互相瞭解了。他租得一間小房子在賈家胡同，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會館，後來又加入一位譚復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瀏陽館。「衡宇望尺咫」，我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面，見面就談學問，常常對吵，每天總大吵一兩場，但吵的結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們大概總得到意見一致。』^(一)

可見，夏曾佑是一個非常好學深思的學者，他同梁啟超一樣，對新生事物充滿了敏感，立志改革，頗想成就一番大事業。梁啟超在《時務報》寫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文章；夏曾佑也想在《國聞報》上大顯身手。本文上引夏氏致汪康年的信件，充分反映了嚴復的維新理論對夏曾佑所產生的啟迪作用。夏曾佑把他在津與嚴復比鄰而居、日夕促談，描繪成爲『能屏絕塵氛，學思並進，則生平亦難遇此境也』。嚴復在與夏曾佑的交談中，把從赫胥黎的《天演論》，到中國傳統經典，古今中外，熔爲一爐，『微言妙旨，往往而遇』，以至於使夏曾佑達到了『念此發奮，不自揣度』的程度。

夏曾佑在戊戌三月初二日寄到上海的信中又稱，『所需文章，嚴老近無暇，弟亦無暇，晚生方作之，日內想可寄上也』。夏曾佑把嚴復稱作『嚴老』，對王修植，則稱作『晚生』。可見，嚴復在這位《國聞報》主筆心目中，是很受尊敬的。顯然，《國聞報》主筆夏曾佑本人在同嚴復接觸後，思想發生了深刻變化，他已經接受了嚴復所宣揚的維新理念，並且把這種理念貫徹到創辦《國聞報》的實踐中。因此，我們把嚴復說成是《國聞報》的靈魂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國

(一) 丁文江等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三四頁。

聞報》在戊戌維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嚴復新思想之主導作用，實在是密不可分的。

三、俄國人爲甚麼仇視《國聞報》

《國聞報》像《時務報》一樣，是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出現的新生事物。尤其是《國聞報》創辦於天津，很有特殊意義。因爲天津乃是緊靠京師的門戶，這裏是對政治特別敏感的地區。然而，從思想方面來說，封建統治者對天津地區的控制，相對來說，要比北京寬鬆得多。而且，在天津紫竹林地區，帝國主義列強星羅棋布地建立了許多租界。尤其是沙皇俄國，對天津的局勢就格外關注。因此，《國聞報》尚未出世，就遇到了創辦者事前沒有料到的困難，這困難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來自沙俄方面，一是來自朝廷內部的守舊勢力。

當時，帝國主義列強爲了加緊對中國侵略，在天津租界裏聚集了許多間諜，這些人無孔不入，投機鑽營。他們中的大多數被稱爲『中國通』。沙俄所派間諜尤其活躍。俄國在天津的代理人陸軍大佐沃嘉克(Wogack)及該國副領事格羅斯的嗅覺特別靈敏。當他們聽到《國聞報》快要成立的消息，立即認識到這是一個操縱社會輿論的極好機會，因此，他們聞風而動，立即同《國聞報》創辦人聯絡，表示願出錢興辦這份報紙。⁽¹⁾

沙俄間諜的嘗試遭到嚴復、王修植等人的嚴辭拒絕。此後，他們又表示在報紙成立後，以購買報紙的形式來表示對報紙的支持。天津維新派由於經費的困乏，對此亦不便干預。王修植在戊戌夏初寫給汪康年的信中曾談到：『《國聞日報》現在每天銷一千五百張（本津五百張、北京二百張、俄商一百五十張、外埠七百餘張）。⁽²⁾王修植在這裏所說的一百五十張，顯然是指俄國商人秉承俄國陸軍大佐沃嘉克及該國副領事格羅斯的旨意而購買的。

早期的《國聞報》曾刊登了一篇名爲《中俄交誼論》的文章。此文之宗旨與維新派力主聯英、日的格調很不協調。已故專門研究嚴復思想的專家王枋先生曾經指出：

(1)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鄭永昌致外務省次官小村壽太郎報告》明治三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新聞雜誌操縱關係雜誌——國聞報》第八頁。

(2)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一冊，第八一頁。

《中俄交誼論》發表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下旬，那時旅大事件已經發生，這篇文章卻提出了聯俄的主張。當日舊黨主聯俄，新黨如康、梁等及帝黨人物，都主聯英、日。《國聞報》是提倡維新變法的報紙，嚴復也是主張維新變法的人物，卻有此論調，實在是頗為費解的。文中對帝俄甚加贊美，以為三國還遼之舉，是帝俄的『仗義執言』，而怪當時有些人『於還我遼東之俄人，竊竊然疑之，不以為德，反以為仇』。初看這些話，頗使人懷疑這篇文章不是嚴復寫的。但細讀這篇文章的格調，似又出乎嚴復之手。^{〔二〕}

王枋先生由於不瞭解《國聞報》成立前後的背景，故有此疑問。實際上，此文乃是嚴復等人為了報館生存而敷衍俄國間諜的文字，不可作為評論他們政治觀點的依據。

事實上，《國聞報》即使登載了《中俄交誼論》，也未能使俄國人滿意。而且，隨著嚴復等人把俄國侵略意圖不斷揭露於報端，以及用很多篇幅對日本維新經驗的宣傳，俄國人愈來愈對嚴復等人恨之入骨。他們時刻都在尋找機會，企圖置嚴復與《國聞報》於死地。

《國聞報》成立後所面對的另一個對手，即是朝廷內部的守舊派。他們對這份剛剛出世的報紙極盡挑剔之能事，想方設法地想整垮《國聞報》。這個機會終於被他們捕捉到了，這就是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十八日兩天該報連載的《總理衙門奏教案辦結膠澳議租摺》。

這是《國聞報》成立後遭遇的第一次危機。現將《國聞報》所刊登的奏摺轉述如下：

《總理衙門奏教案辦結膠澳議租摺》

奏為曹州教案辦結，膠澳劃界議租，謹將與德國使臣商定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本年十月間，山東曹州地方殺斃德國教士二名，德國兵船遽襲膠州，該使臣海靖致臣衙門照會，要求六款，勢將

〔二〕 王枋主編：《嚴復集》，第二冊，第四三七頁。